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二六期 ——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2a)

【口述历史】 风雨八十载——洗恒汉自述 (节选上) 洗恒汉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口述历史】

风雨八十载——洗恒汉自述 (节选上)

• 洗恒汉 •

洗恒汉 (1911—1992) 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主政甘肃，一九七七年被免职，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十年文革 (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 官罢西山

◇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

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58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2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让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师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

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301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301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终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别？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 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行。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

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同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

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我戴上了一项“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发的记录）。

◇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我

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人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洗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了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是，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先楚、宋平等军区 and 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都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洗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

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洗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第二章 军内“四大”

◇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覺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6、7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8月1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X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

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XX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年7、8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〇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立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没有任何下文。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责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记清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到底是谁在“乱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 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X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讲王当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肖华要把王X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

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 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 X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 X和张X X拉到海运仓。

1967年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 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冼家帮”时，却把王X X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冼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冼恒汉一手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X X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王X 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子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5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

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还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同志的具体指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杨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到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歉。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既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张、洗！”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锅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

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捡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到北京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 毛主席说：“张、洗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一个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大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同志说：“张、洗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

些接触中，主席又几次讲过“洗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他说：“洗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洗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总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第三章 十年“支左”

◇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

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全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瘁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21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拥护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的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

然具体措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吧。

◇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组织。

◇ “三个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斗，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是实际情况。

◇ 复工复课“闹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兰炼、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

的多项条款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